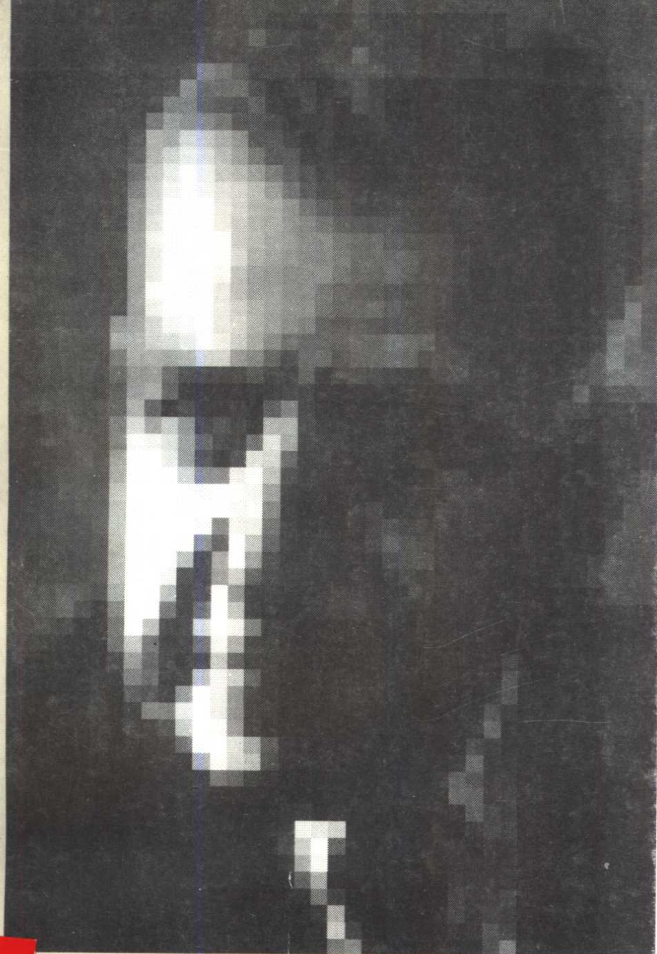


HEINRICH MANN TRANS. BY FENG YALIN WORLD MASTER THINKERS



亨利希·曼

〔德〕克劳斯·施勒特尔 著

冯亚琳 译

亨利希·曼

[德] 克劳斯·施勒特尔 著

冯亚琳 译

(京) 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孙乃修

责任校对：江汶伟

封面设计：杨永德

版式设计：李 勇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亨利希·曼

[德] 克劳斯·施勒特尔 著

冯亚琳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艾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照排

中国建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2 年 8 月 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36×965 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19 千字 印数：1—3500 册

ISBN 7-5004-1371-8/B·307 定价：5.10 元

Klaus Schröter

HEINRICH MANN

Veröffentlicht im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1967

本书据罗沃尔特出版社 1967 年德文版译出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主 编：张晓明

副主编：章建刚

编 委：安延明 孙乃修 刘 继

李 河 李鹏程 张晓明

何明虹 章建刚

美 编：张 强 杨永德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

编者献辞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和有关编辑富于勇气的决定，《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从1985年到1992年，《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断断续续出版了36本。在编辑这套文库时，我们出于整体上的考虑收入了其中31种，并全力推出29本新书，形成了目前的规模。文库包含6个函套，每个函套中的10本书大致是依照传记主人公的生活年代编定的，读者在阅读之后或许会对某个思想时代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读者，此次未被编入文库的5本思想传记，无论就传主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就译文的质量而言，都丝毫不比目前这60本逊色，它们是：《柏克》、《亚

当·斯密》、《赫尔岑》、《托尔斯泰》和《福泽谕吉》。

值此文库出版之际，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1985年7月，我们在着手这项工作时曾设想“在三至五年内出书百本以上”。事实证明这个想法过于浪漫了。主观的愿望和努力在复杂的客观现实面前总是要脆弱一些，而后者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套丛书的命运：起初，《尼采》和《叔本华》等书在某家电视台的画面上被归入“黄书”一类；其后，理论图书市场的滑坡又几乎使这桩事业半途而废。因此，在推出《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的时候，我们几乎无暇为这个国内数十年来第一套大型思想传记丛书的最终出版而感到庆幸，我们更意识到：这套丛书的遭遇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命运，并且它似乎还很难在世纪的转折之前有根本的改善。

经济的繁荣是世纪末的主题，这对于我们这个饱受一穷二白之苦的民族来说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同样现实的是，在素有“启蒙运动”之称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七十余年中，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没有塑造出一个能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地位相称的独立学统，这种迟缓的进程在世界各大文明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不

多见的。破坏多于建设，情感多于理性，我们的思想文化总处于一种“无根的”流放状态。且不说这种思想文化的贫困已经并将继续给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带来怎样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普遍缺乏理论教化、思想表现和自我意识，那么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只会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过客，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说过：“思想即供奉。”我们献给读者的这套《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正是用以供奉思想的一个祭坛。与思想家同在，与人类文明的成果同在，这应是我们民族现代化理想的一个重要内涵。

此时此刻，我们尚无从琢磨新世纪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仍祈盼着它的到来，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旧世纪的结束！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1993年3月13日

中译本序

没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责任，人将不能称其为人。谁想让人们这样，谁就在思想上剥去了他们为人的尊严。

——亨利希·曼

亨利希·曼是托马斯·曼的哥哥，比他大四岁。曼氏家族中的这位老大，无论在思想深刻性方面，还是在政治洞察力方面，或是在社会批判性方面，都胜过弟弟一筹。他是一位眼光深邃、见解深刻、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批判意识的思想型作家。他喜爱思辨，喜欢探讨精神的底蕴，揭示市民阶层的庸人习气和民族性格的劣根性，总是用一双冷峻、沉着的思想家式的眼光和无情的解剖家式的笔锋描绘和揭示社会现实及其形形色色的人物。他的一生都在与社

会上的恶势力和专制制度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丝毫不妥协，从不为自己的现实利益和地位而出卖灵魂。他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和深厚的思想素质。这是一位站在思想高峰上洞察现实和分析社会的杰出思想家和作家。他使我们不由地想到中国的鲁迅。

亨利希·曼从法国作家和思想家那里汲取了丰富的精神乳汁，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人权观念、自由和平等思想，给了他深刻的思想影响。他热爱法国，赞颂法国那种民主精神（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弟弟之赞美普鲁士及其专制制度形成鲜明对照）。他显然是把法国民主制作为德国君主制的对立面而加以颂扬。他深刻地指出：“走共和国的道路并不是要通往‘表面的文明’，共和国是法国的必由之路。它的本质，它的人权观念，它的批判文学的精神状态以及它的知识分子的纯洁性都促使它走这条路。正是这种纯洁性，不允许它从纯理性中剔出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仅仅由于它舒适和有用就苟安于一个已无真实思想性的国家形式。”人权观念、民主制度、批判精神以及知识分子的纯洁性，这些法国文化遗产为这位德国作家确立了坚实的思想根基，孕育了犀利的政治批判眼光。他彻底否定了德国君主专制政体及

其社会制度，并且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德国各个社会阶层，特别是市民阶层及市民习气。

思想上的成熟和深刻，使他在文学创作和主题开掘上产生一种别具一格的特质和震动人心的思想效果。在小说《垃圾教授》中，他从“人性荒诞和污浊”这一角度出发，刻画了一个暴君的形象，这个人物宁可走向毁灭，也不能容忍对他的任何一点约束；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民众的仇恨，这种仇恨又变成一种病态的痛苦；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刺激，他就会唤来打手，在宫中杀人放火，急急忙忙宣告出现紧急状态。显然，在这位心灵扭曲的教授身上，作者表达出一种社会批判倾向和政治讽刺意蕴。

他有着清醒的人格意识。他指出：“我具有完全独立的人格。”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在争取社会民主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他号召德国知识分子们起来反对强大的德国君主制和独裁专制统治。他指出：“铁腕和独裁统治者必然是我们的敌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他甘愿附庸于统治阶层，那么他就背叛了精神。”他的这一革命号召，一旦变为实践，专制暴君扫射过革命工人的那些冰冷的枪口就要扭转来面对着他们了。

亨利希·曼不是在一一切都滑向毁灭时去美

化德意志帝国的腐败现实，而是通过对病态的社会现状的揭露达到批判帝国社会及其政治基础这一目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专制主义那里留下的是欺骗性，从议会制那里继承的是它的可贿赂性，这就是药方。它的表现便是皇帝的碌碌无为：想懂得一切、但却没有什么是真正能懂的和喜爱的，无处不在却无济于事。……只有一副假象，一副演戏用的面具。……在这一国度里，为人师表的典范正是这样一类人物。除此之外，还有泛德意志主义的哲学论断——这是一帮玩忽职守的、蜕化了的文人教授们在酒足饭饱之后所炮制的谬论。利用它的是军事和工业的巨头们。”他笔锋的另一面，则毫不留情地指向专制制度奴化教育下的那些帝国顺民，那些奴颜婢膝的势利小人，那种德国的庸人习气，和诚惶诚恐的市民性格。他指出，专制制度造就出来的不是堂堂正正的公民，而是萎靡琐琐的“臣仆灵魂”，即奴隶根性。它培育出来的不是性格健全、有人格尊严的男子汉，而是卑躬屈膝、浑浑噩噩、诚惶诚恐、神经衰弱之类的扭曲性格和畸形人物，是一种庸人习气。他最早在小说《垃圾教授》中提出“臣仆灵魂”这一概念，在他成熟期创作的最重要小说《臣仆》中则对这一概念的根源、影响和表征做了形象的揭示。他为

《臣仆》拟了这样一个副题——“威廉二世时代公众灵魂的故事”。他是把刻画民族的病态性格及其精神上的劣根性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旨。他笔下的臣仆具有这样一种特点：他一方面肆无忌惮地追求权力和地位，以求统治他人，另一方面又俯首帖耳，甘当统治者的走狗和打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抒发了这样一段议论：“这权势把饥饿、反抗和讥讽都踩在脚下。我们对它只有俯首帖耳，因为我们喜爱它。它存在于我们的血液之中，因为我们的血液里含有驯服的天性。”灵魂的下跪与驯服，血液中的奴才根性，这是最大的悲哀。既要作奴才，又想作主子，作主子的欲望与作奴才的根性既矛盾又统一，主子与奴才一而二，二而一，集中在每一个庸人和官吏身上。最妙的是，在小说中，皇帝与臣仆们常常等同，有一种主仆同一的意味。同时每个人又都不得不用谎言来维护自己的体面。这种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各角落的“臣仆灵魂”，成为德意志专制帝国最典型、最普遍、最庸俗的一种人物形象和社会形象。作者通过对人物精神性格的这种深刻洞察和剖析，无情地批判了整个德意志民族君主专制的历史和现状，鞭挞了这种体制的野蛮性、荒诞性和非人道性，及其对民众精神和心理产生的那种深入血液和骨髓

的毒害与扭曲。

亨利希·曼的笔锋是犀利的，心情是沉重的。他深知德国专制历史之长久与深固，深知这种罪恶的政治体制给民众带来的那种极深的精神伤害。他悲哀地为《臣仆》写了这样一句题辞：“这个民族毫无希望。”亨利希·曼始终以严肃的批判态度和挑战姿态对待德国现实，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也始终以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来描写社会及其芸芸众生相。他痛恶帝国首相俾斯麦那种铁与血的统治，愤慨地把开枪杀死工人的士兵受到皇帝嘉奖和提升这一事实（即“扎贝因事件”）写进《臣仆》一书中，从而揭示出所谓“共和国完全是一派谎言”。他在广场上当众朗读自己的作品，努力对时政施展自己的影响，使他的作品在德意志民众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崛起和得势，他早在1931年12月就曾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指出它将来必然失败的命运：“请注意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法西斯主义将来在德国是要灭亡的……现在有专制，有资产者，这是事实，而且还有持久的内战。只要有28万兵的希特勒分子的军队存在，它就必然要行动。而只要它敢于进攻，就必然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在希特勒

登台之前几天，担任普鲁士艺术院文学分院院长的亨利希·曼与画家珂勒惠支、科学家爱因斯坦共同签发了一个呼吁书，号召人们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专政。他因此遭到纳粹迫害，被解除职务并被艺术院除名，罪名是“参与党派政治活动”。同年8月被剥夺国籍。从此，他流亡法国，开始了后半生的流亡生涯。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已经清醒地对历史作过反思。他从德国历史的发展中看出了现代纳粹的历史根源。他在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篇论文《超民族主义信仰》（1932年12月）中，论述了德国自1848年开始持续发展的反民主的国家政策。这种政策在1871年由于帝国的建立而得到稳固，与民族的统一（针对自由的统一）实现后崛起的那种建立德意志强国的思想高潮之间亦有联系。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政治上的失败及其愚蠢的所谓“霸权帝国”的战略方向，则加剧了反民主倾向。而魏玛共和国继承的则是旧的统治制度，劳动群众依然处于无权地位，共和国不过是一块空牌子。从这一清醒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中，他敏锐地洞察并预感到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历史逻辑及其必然性。他对历史进程作出这样的结论：“非理性的再一次当道，给人类的弱点提供了良机，

不理智地任性，凭本能行事。……在这种情况下，本世纪起决定性的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才得以发展，直至它的极限，……非理性时代不结束，这一运动就得不到制止。”他在这篇文章中愤怒地写道：“我背叛旧的强权和民族国家，是因为它的道德内涵已丧失殆尽……，人成了民族主义谎言的牺牲品。我不愿再听到什么不是为人性、而是反人性的斗争是崇高的职责等等一派胡言。”他蔑视那些纳粹分子。他在法国流亡期间写的第一本书题名为《仇恨集》，意指纳粹分子对人类、人类文化和社会进步的仇恨与敌视。

亨利希·曼对现实的思考和批判，还渗透到历史题材和创作中。他塑造历史人物、再现历史时代，命意则在于以古喻今，以史鉴今。《腓特烈大帝痛史》、《亨利四世》的创作，就充盈着这种活生生的现实感。在《亨利四世》中，他塑造了这位法国开明君主形象，一个正面榜样，一位好皇帝，以此颂扬人文主义政治理想。与亨利四世这个开明的政权相对的，则是一帮愚蠢的、丧尽良心的邪恶势力。他通过这位人文主义政治家来高扬建立在理智和知识基础上的人的形象。这个人物敢于投身抗暴，从而完成人文主义的崇高使命。他强调这部作品的隐喻性，使读者时

时想到希特勒、戈林、戈培尔这伙纳粹党棍的种种倒行逆施。他指出：“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所干的勾当。他们借口是捍卫信仰，维护世界观。……而真实情况却被淹没在黑暗之中。”这部历史作品同《臣仆》一样，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同时又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有力武器。

亨利希·曼是一个眼光锐利、思想深刻的作家。他敏于探索人生和社会，历史和未来，热烈地追求着思想和真知，人道和正义。这使他同弟弟托马斯·曼在思想观念、政治见解以及对现实的态度方面一度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和尖锐的对立，双方各执己见，二人遂于1914年（托马斯·曼发表《战争中的思考》一文之后）断绝关系，直到1922年弟弟思想转变后才和解。

从1903年起，兄弟之间不同观点的交锋和论战就开始了。托马斯讥讽哥哥的长篇小说《女神》（1903年）中的那种批判性、政治性内容。而亨利希则从弟弟的《王爷殿下》中看出那种隐约不断的倾向，即反对重新提出人权要求，甚至反对平等。他不点名地批评弟弟是“反动文学家中的一个；他们象征性地拿来人民的生活，以装饰自己高贵的经历……，不认识自由，却对它加以蔑视”。事实很快证明了亨利希这番话的正确性。托马斯则指责哥哥：“你的世界观的转变越

来越走向自由主义。”1914年11月，托马斯发表了《战争中的思考》一文，把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说成是“伟大的、正义的、庄严的战争”，还称颂其国家体制为“我们的社会君主制”，并且以“德国魂”来为之涂脂抹粉。弟弟的这种狭隘民族观念和反动的政治立场深深刺痛和伤害了亨利希的心。亨利希不能不与弟弟分手，他写道：“最严峻的考验开始了，它迫使有思想的人选择自己的道路，或者作眼下的胜利者，或者为永久的事业而奋斗。看上去似乎同是出类拔萃的战友们，一时间都翻脸了。这些人毁了，这些生命毁了。……（他们）以优雅的姿态去反对真理和正义了。……他们在眼前和历史之间作出了选择。他们尽管具有一切天赋，却甘于充当只会消遣的寄生虫。”（《论左拉》，1915年）

德国经济繁荣时期的强权观念受到托马斯的推崇，他为德国入侵比利时辩护，并且拒绝承认“正义”是一种“公约”，一种“人类声音”，只认为它是“上升势力的权力”。亨利希立即作出批驳：“然而，什么是权力，如果它不是正义的话？最深刻的正义扎根于完成义务、斗争得来的理想、以及提高了人性的良知之中。一个只是建立在暴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和真理上的帝国，一个只有命令和驯服、钱财和剥削、而